

守护文物不能总指望“凡人义举”

玉渊杂谭

杨雪

因为故宫办的一场追思会,何刚,一位平凡农民的凄苦一生被放大于公众面前——32年前毅然决然将所挖文物悉数捐赠,32年里勤勤恳恳抵挡不住生活贫困,小人物的悲情命运既高尚如清流,又卑微如蝼蚁,读来令人五味杂陈。

在找不到坏人的悲剧里,何刚是首当其冲的厚道老实人。借钱买车票进京献宝,不为“一袋子钱”所动全部交公,这

些无论放在80年代还是现在,对普通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看客容易麻木,但试想这事如果摊自己身上,在巨额的个人利益和保护国家文物之间,取舍绝对比刀割还痛。

从对何刚求援的回看,故宫也真的尽力了。毕竟,在无法可依、无例可循、无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故宫并没有义务长期救助一个捐赠者。其实要说1984年的8000块奖金,并不是小数目。之后故宫在可能的权限范围内二度提供救助款,也是职能之外的事。还有农民之名登上“景仁榜”,在帝王宫苑为一介草民

开追思会……都体现了故宫对待“凡人义举”的人文关怀。

突然觉得何刚有点像“流血又流泪”的见义勇为英雄,选择了道德高点,把自己至于绝处。不过相比而言,何刚的“凡人义举”则更为凄凉——有温情的帮扶也敌不过长贫难顾的硬道理。当然,这看起来好像是社会的错,但实际上,文物捐赠制度的缺失难辞其咎。我国现有法律对主动上交文物者应享有的精神、物质奖励缺乏明确标准。也就是说,守护国家文物这么大的事,还在指望个人道德选择的“一念之间”,着实和当下经济发展趋势不匹配。

农民挖出文物,可以算作我国文物出土的一大渠道。而由于国情特殊,应对这类文物捐赠者出台政策予以奖励,并在捐赠者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何刚事件前车可鉴,这是文物捐赠制度早该补的课。但更重要的是,应根据捐赠的文物价值和发现地点、文物级别、时代等,制定出相对统一和完善的标准,用一套可操作的文物捐赠制度来保障文物和捐赠者双方的利益。

今时不同往日,消费主义引领的社会,就算生活过得不错的,也没人赚得多。在守护文物这个问题上,总想着依赖“凡人义举”,不仅抠门,而且天真。

“灵学”泥沼中的科学家们

科林碎玉

史晓雷



从19世纪中叶到该世纪末,一股“灵学”热潮席卷美国和欧洲。所谓“灵学”,是当时的信奉者认为存在可以沟通冥界的灵媒,能够与灵魂对话。信奉者通常会举办“降神会”(也译作招魂术)的表演,灵媒通过“法术”与灵魂对话。这种表演颇似去过我国农村常见的“鬼附身”。这股“灵学”极具迷惑性,一时俘虜了众多科学大家,甚至成立了专门的灵学研究学会,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当时英国的大科学家克鲁克斯和华莱士都热衷于此。

1871年,克鲁克斯出席了一次降神会。这次降神会上的灵媒是一位叫弗洛伦斯·库克的小姐,库克小姐让人用绳子把自己捆住,躺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在她陷入昏睡状态时,屋子中间便会出现一位神似库克小姐、但自称叫凯蒂·金的灵媒。她赤着脚,披着飘逸的长发。现场有的观众为了验证她是不是库克小姐的化身,居然上前拦腰把她紧紧抱住,结果现场乱作一团,瓦斯灯也被弄熄了。待灯重新点亮后,一切趋于平静,库克小姐依然被捆绑着躺在角落,凯蒂·金却不见了。抱到凯蒂·金的观众坚称,他抱的就是库克小姐。眼前出现的奇妙场景,让作为观众的克鲁克斯受到了极大震撼。

克鲁克斯并不知道,他即将走上一条背离科学的不归路。尽管他的出发点非常纯粹,只是打算用科学的方法验证灵媒到底存在与否。他甚至运用了一些物理仪器,比如弹簧秤什么的去测量。库克小姐看他着了迷,便“极力配合”,很快他们彼此建立了“信任”。最后,克鲁克斯主动邀请库克小姐到家中,与他的孩子聊她过去在印度的经历。与此同时,库克小姐也允许克鲁克斯测量她的脉搏和呼吸,以帮助其“研究”灵媒。最后的结局很可悲。克鲁克斯完全陷入了库克小姐的圈套,对灵媒深信不疑。他甚至荒唐地说道,除非一切设备由他布置,否则库克小姐拒绝降神。显而易见的意思是,库克小姐的降神只有在她的“配合”下才能完成。当然,克鲁克斯在灵学方面的研究自然一无所获,唯一的“成果”,只是对当时欧洲盛行的灵学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说克鲁克斯侧重灵学方面的实践探索,那么华莱士应该算是灵学先驱中的理论派了。不过若论“入道”时间早晚的话,华莱士要更早。他也亲自参加降神会,尤其对“神灵照相”情有独钟,比如他坚信在某些照片中存在着智慧的,但肉眼看不到的“存在物”。即使在有人揭穿其是伪造之后,华莱士也执迷不悟。不但如此,他还撰写小册子《超自然的科学方面》,宣扬他的神奇体验及灵学的意义。

为什么像克鲁克斯和华莱士这样的科学大家会乖乖向伪科学投降?恩格斯在晚年写了一篇文章《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对这些陷入唯理论的科学家进行了批判,并指出其根源是“经验主义的束缚”。通俗地说,就是他们迷信“经验的事实”(有时荒唐到了他们认为自己在场的幻象,神迹就不会发生的地步),缺乏理论思维、分析的头脑,因此陷入了唯理论的泥沼。

近年来,类似当年灵学研究的伪科学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有的声称自己有某种特异功能,有的声称意识致动,造成了物质等等。某些电视台为了追求收视率,为这些伪科学搭台唱戏,“大师”们肆无忌惮地表演,观众啧啧称奇、一片叫好,殊不知已悄悄上了伪科学的贼船。恩格斯当年的告诫犹在耳畔:当心呀,这些“奇妙”的经验!

摄手作

绿

(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碧玉妆成一树高,玉阶人静一蝉声。



本报记者 孙韵孜摄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我们为什么需要话剧

桂下漫笔

胡一峰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当然,中国话剧到底诞生于哪一年,本身存在争议,双方各有许多理由。不过,或许还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我们为什么需要话剧?这样,无论考察历史还是观察当下,反而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和启发。

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人无法绕开,这就是余上沅。他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掌门人,也是近代“国剧运动”的发起者。余上沅的青少年时代在湖北度过,沐浴着新文化运动的阳光,与恽代英、林育南等革命者相过从,也曾是学生运动的弄潮儿。1920年,他来到北京大学英文系读书,1922年到清华学堂任助教,次年以半公费赴美留学,先在匹兹堡的卡内基大学戏剧系,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西洋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回国后,又在国立北京艺专等校授课。1935年开始主持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随着政局变动,学校从南京迁到四川江安又迁回南京,但余上沅一直坚持这块园地,十四年间,培养了大批戏

剧人才。

余上沅留下的著述不多,谈话剧理论的更少。不过,在这位中国话剧祖师爷级的艺术家那里,对“我们为什么需要话剧”早就有了答案。上世纪20年代,他在《我为什么要学戏剧》中说:“许多朋友很疑惑我为什么要学戏?其实这也用不着详细解释,简单一句话,因为我爱‘她’。我在武昌念书时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谁知一到政治中心的北京,我反而和文学结了婚。和她同居了两年,觉得她面庞尤其可爱;因为她面部有眉,眉能言语;有目,目能听话。越和她亲近,越觉得她全部的美、生气、灵魂,都聚集而涌现在面庞上、眉目之间。其神妙之处,竟把世上的美融会贯通在这里面了。这就是我爱文学而尤其爱戏剧的原因。”他还说过,要终身做戏剧的“仆人”。为此,几年后,他在给戏剧理论家宋春舫的一封信中说:“吃饭是一件小事,万一做穷教员也做不着,做木工也未尝不妙”,最发愁的是没有机会从事他喜爱的话剧。

若说这只是余上沅的夫子自道,那么,我们还可以从他1925年的一封信里找到更具普遍性与理论色彩的回答。这

封信是写给清华同学的,登在那一年的《清华周刊》上。他写道,一个国家是应当图谋富强的,但富强只是手段绝不是目的,“正如人绝不是因为吃饭而生活一样”。“国家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以为是:把人类的一部分归纳于一个完善的组织之中,使他成为一个有机的单位;若不同性质的组织彼此互相辅助着,使人类得以享受最完美的生活。”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点呢?“不能不在美术上去努力,尤不能不在美术之汇总的戏剧艺术上去努力!”此处所谓“美术”,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艺术”,而在上世纪20年代,戏剧确实是当时艺术门类中综合性很强的一种。在余上沅看来,“惟有艺术可以把人们卑劣而丑恶的胸襟感化而为高洁而且美好”,他的志愿就是“用高贵的艺术来图谋社会人群的幸福”。可以说,余上沅的话剧发生论是“双线复合”的,同时指向个体和群体两个目标。相应地,他理想中的话剧也就具有美化人生、收拾人心两大功效。这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追求个性解放,塑造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是知识界孜孜以求的事业,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呼声也在高

扬。一批“国”字头的概念在当时蓬勃兴起,比如美术界的“国画”,医学界的“国医”,体育界的“国术”,当然还有涵盖更广的“国学”。就像今天什么东西都是“互联网+”一样,当年,“国+”也是一股来势汹汹的潮流。我想,余上沅和他的朋友们发起的“国剧运动”也应作如是观。后来,新的国家终于建立起来了,“国+”的思潮却衰落下去,余上沅心心念念的“国剧”最终也没有收获满意的结局。

不过,余上沅这一代人从西方引进和推行的话剧确实在中国土地上扎下了根,开枝散叶,长势不错。如今,各种话剧“节”或“展”层出不穷,IP戏剧等新名词频频出现,看话剧几乎成了城市文艺青年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即便如此,余上沅当年所希望于话剧的,依然值得咀嚼,当我们痛感于生活的乏味或社会的撕裂时,就更是如此。话剧乃至一切艺术,最终所给予人的,不应只是一个五色炫目的舞台,或一个精巧哀婉的故事,而是一种艺术精神,它能荡涤人心中的卑劣丑恶,同时又是一种美的力量,让生活趋向高洁和美好。今年恰好是余上沅诞辰120周年,当我们回望这位话剧先贤,不妨在这里划一下重点吧。

古人的夏至感喟

诗话节气

谢君

“夏至阴生景渐催,百年已半堪哀。”夏至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中排在第十位,却是出现最早的节气之一,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记载。夏至一般出现在公历六月二十二日前后。古人早就观察到这一天太阳最高,白昼最长,夜晚最短,且从此阳盛极而衰,阴衰极而盛。因此,夏至是阴阳此长彼消的分水岭,具有标志性意义,很容易引发诗人们的感喟。历代写到夏至的诗词不在少数。

上文那句出自“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刘基的《夏日杂兴》(其六),刘基就是赫赫有名的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然而,他的前半生也曾受尽蹉跎,郁郁不得志,空有才华和抱负而不得施展,一度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而著诗文。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出山辅佐朱元璋之前的隐居时光。年近半百,壮志未酬,功业未成,英雄空老,对时序的变迁极为敏感,又恰逢夏至,阴生而景变,更是触发了他内心紧绷的那根敏感神经,生发出对岁月、对人生的无限感慨。

在中国诗歌史上,像刘伯温一样因时序的变化而兴起对时间、对生命、对人生、对梦想的感喟可连成一条长河。而在这长河中,夏至是一个重要的坐标。

由于从这一天开始白昼越来越短,因而人们眼中的夏至首先是光阴流失的标识,生发出的感喟首先是针对于时间和生命而来的。如唐代文学家权德舆在《夏至日作》一诗中写道:“曙枢不停运,四序相错行。寄言赫曦衰,今日一阴生。”“曙枢”就是北斗星。北斗星不停运转,四季更迭,倏然之间,就到夏至,阴气从这一天开始滋长。诗人敏感感知到时间的流失,虽无多言,字里行间却是对夏至猛然到来的惊愕与对时光飞逝的惋惜之情。

宋代诗人张耒同样从节候与景物的渐变中体会到时间的流失、生命的变迁以及变化的伟力。他在《夏至》诗中感慨道:“长养功已极,大运忽云迁。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忽更柄,寒暑将成年。崔嵬干云

树,安得保芳鲜。几微物所忽,渐进理必然。黠哉观化子,默坐付忘言。”

从夏至日起,阴阳力量比对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阳主生而阴主杀,意味着从此杀生更柄;阳为暑,阴为寒,意味着从此寒暑更变。一切生命都在不断变化,没有什么能永葆鲜活,世界在渐变中运转,造化非人力所能改变。诗中深含哲理,是作者由夏至的阴阳变化而获得的对宇宙、对生命运行变化的深刻领悟。

夏至所引发的时间飞逝感还很容易带动人们对亲友、故乡以及往昔的思念与回忆。唐代诗人令狐楚在夏至这天想到自己的年事已高,远离故乡,亲友凋零,不禁生发出无限感慨,希望能飞上天门,上訴天公:“新节还夏至,故交尽相捐。何时孤圃闾,上訴高天。”

同样因夏至的到来而兴起了怀乡思归之情的白居易,写下了《思归》诗:“夏至一阴生,稍稍夕漏迟。块然抱愁者,长夜独先知。悠悠乡关路,梦去身不随。坐惜时节变,蝉鸣槐花枝。”这时的白居易初任校书郎,正值夏至,因时序的变迁,想起了自己因官离家多时,远离父母,不能尽孝养亲,心怀忧愁,思亲怀乡,意欲归去。这一切皆因“夏至一阴生,稍稍夕漏迟”而变得异常强烈。

除了思亲怀乡外,白居易在夏至这天想起了朋友以及朋友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在《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一诗中,他写道:“忆在苏州日,常谓夏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水部多苍术,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交印君相次,襄帷我在前。此乡俱老矣,东望共依然。洛下麦秋月,江南梅雨天。齐云楼上事,已上十三年。”

当年在苏州的夏至日,诗人与朋友们大摆筵宴,吃粽子,烤鲜鹅,歌酒载船,好不快活。如今十数年已过去,大家俱老矣,只能向东遥望着苏州,在记忆里回味江南夏至时的美景与美事了。

类似的夏至诗歌我们不能一一列举。总之,夏至因其标志性的意义,总是周而复始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在飞逝,生命在老去,亲友在零落,梦想在远去,怎能不引发人无限感喟。这些感喟,古今一也。

地理学,带你去看花花世界

字里行间

李昊

什么样的植被,盛产什么样的作物……作为人类最古老学科之一,地理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人们探索的视线已经投向浩瀚宇宙,越来越少有人关注,我们每天脚踏着的这片坚实土地。

美国学者阿瑟·格蒂斯、朱迪丝·格蒂斯夫妇和杰尔姆·D·费尔曼一同完成的《地理学与生活》,是介绍地理学知识的通俗读物,专注于地理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帮助我们了解长期以来被大众误解的地理学。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如果说历史是研究时间的学问,那么地理就是专注于研究空间的学科。书中对“地理学”的定义,比我们通常的认知更富于趣味性:“地理学是研究空间变化的学科……正如知道了人体各个器官的名称和位置,只是了解它们为什么会在那里,以及是什么时候、哪些过程决定或改变了它们分布的第一步……为什么地震通常发生在土耳其,而不是俄罗斯?为什么山地在美国东部是浑圆的,而在美国西部是高峻而崎岖的?为什么讲法语的人集中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而不是加拿大其他地区?”看吧,“地理”作为一门“科学”,探究的是那些知识背后的“为什么”。

在作者看来,地理学探讨的是地球表层中的重要特征,空间结构中的变化,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生存关系。人类生活在地球之上,地理学理论也构成了我们研究探索生产生活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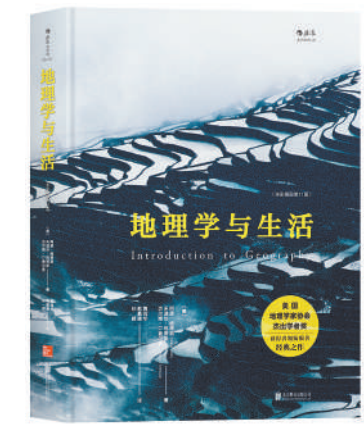
地理学在学科教育体系中的长期遇冷,和我们的地理学教育特点有关。我们小学、中学的地理学教育,往往强调死记硬背知识点,过早地让人失去了对这门学科的兴趣。作为通识课读本,《地理学与生活》更强调思辨教育,力图向人们传递这样一种认知:地理是有趣的,更是有用的,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纷繁的世界,解决现实的问题。

比如,学地理,能做什么职业?作者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地理学专业的多种职业发展方向。自然地理学专业,不像人们固有印象中那样“高冷”,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天气预报员、户外向导、水文学家、海岸管理、土壤保护与农业推广……具有经济地理学背景的学生,可以从事企业选址分析师、房地产评估师等工作,听起来,倒有点像科学化的“风水先生”。城市规划也是地理学下属的分支专业,这个专业就更“接地气”了,城市与社区规划

师、交通运输规划师、住房、公园与休闲规划师……当然,也有高深莫测的,比如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去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制图师、地图管理员、GIS专家、遥感分析师和测量师等等。

这样的介绍,使得欧美的高中生在就读大学的时候,大多都了解各个专业的职业发展,帮助他们更理性、更精准地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未来发展选择职业。

清朝末年,魏源提出破除闭关锁国的限制,“开眼看世界”。他编写的《海国图志》,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成为我国现代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毛泽东也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论述过地理学的重要性:“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地理学,作为任何一个时代最重要的通识教育内容之一,是我们开眼看世界的必然选择。美国科幻小说作家洛夫克拉夫特曾说:“我们都是广阔空间里的流浪者,漫长岁月中的旅行家。”尽管我们被城市的钢筋丛林所束缚,但有空不妨翻开书卷,通过认识地理学,去看看那绚丽缤纷的花花世界。



地理是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它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学科名词,一张地图,一架地球仪。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地理”往往只意味着“地点”“方位”,或是中学地理课本上死记硬背下来的知识点:大陆板块、山脉和河流的位置,哪个国家在哪个大洲,哪条河流最长,哪座山脉最高,哪里覆盖着